

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黄 维,廖小薇,阳立高,要攀攀,颜佳琳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摘 要:基于严格随机抽样的湖南省7所高校2557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和样本自选择偏差后,经济资助能显著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水平。但这种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仅获得奖/助学金等无偿型资助的大学生在提升政治信任水平方面的效果最为显著,而仅获得助学贷款等偿还型资助和同时获得偿还型和无偿型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的效果并不显著。对大学生经济资助育人效果的考察不能仅局限于探讨经济资助对大学生自身发展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其在更为宏观的政治层面所带来的效果。

关键词:经济资助;大学生;政治信任;得分倾向匹配法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2)01-0147-12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id on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HUANG Wei, LIAO Xiaowei, YANG Ligao, YAO Panpan, YAN Jia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2557 college students from 7 universities in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which is strictly randomly sample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i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aid on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s and sample self-selection bias, financial aid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However, this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College students who only received gift aid like grants/bursaries have almost significant higher level of political trust, while No significant results are shown for the sample group who only received self-help aid such as student loans and the group who received both gift aid and self-help ai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eff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aid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exploring th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while its effects on a more macro-political level needs to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financial aid;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propensity scoring matching method

近20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大规模变革,政府不仅逐步在高等教育阶段实行了成本分担和大学全面收费政策,大幅度改革了资助体系来满足大学生的经济需求,而且对学业

优异的大学生进行奖励。目前,我国目前已经构建了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助学贷款、应征入伍国家资助、师范生公费教育、新生入学资助等相结合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

收稿日期:2021-09-01 修回日期:2022-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新时代高校学生资助提升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机理、效应测度与政策路径研究”(19VSZ118)。

作者简介:黄维(1974—),男,回族,湖南汉寿人,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大学生资助政策与大学生政治信任评估研究。通信作者:阳立高。

相较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对完善和成熟的大学生资助体系,我国大学生资助体系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建立时间比较晚,但发展速度比较快。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始于 21 世纪初。2007 年以后,我国大学生资助获得了较快发展。二是政府主导了我国大学生资助体系,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而发达国家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我国为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主体是政府,为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开展的,并具备高度组织化、政治化。我国政府在大學生资助体系构建上的努力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有效缓解了低收入家庭因子女上大学致贫返贫的难题、显著提升了高等教育参与和入学机会^[1-2]。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逐步成为实现社会公平、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3]。以整体来看,公众对大学生经济资助体系持肯定态度。

已有文献从资助政策体系自身出发,主要考察我国大学生经济资助体系的优化、国际经验的借鉴等问题^[4-6]。特别是,2010 年以来,我国政府和高校不仅将“精准资助”作为高等教育资助的政策理念,而且将大学生资助工作转向资助育人模式,即不仅从解决大学生当前的就学经济困难,而且上升到大学生的长远发展,关注其全面素质和能力的提升^[7]。研究发现,经济资助能显著促进大学生发展,包括领导力、人际交往能力、就业质量和学业发展^[8-10]。但从国家层面来看,为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技术安排,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弥补社会发展裂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权秩序是首要关注目标^[11]。就中国而言,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策供给的重要目标。政策供给通过改善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人民的生活,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旨在“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忧”^[12]。因此,对大学生经济资助育人效果的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探讨经济资助对大学生自身发展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其更为宏观的社会效应。

政治信任是联系政府与公众的重要纽带,高度的政治信任不仅有助于政权的持续与稳定,而且为政府提供广阔的操作空间^[13]。已有文献对于政治信任的概念有多种定义,表述不一。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是公众对国家政治系统及相关机构或人员运作能够产生与预期一致结果的信念和信心^[14]。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代表人们对于政府和官员的态度,是关于未来的预期,而不是当前的状态^[15]。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对于政治信任的对象并未取得普遍共识而产生的。我们认为,政治信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治信任,包括了公众对政治制度、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政治精英的信任以及多党制体制下公众对不同政党和政治派别的信任等。而狭义上的政治信任主要是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作为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精英群体,大学生历来是国内外社会群体政治信任的风向标。大学生处于成年政治价值观的初显期,世界观的改变是其认知发展中最核心的部分^[16]。大学生政治信任不仅是衡量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而且大学时期的政治信任也会影响到个体未来的政治参与、政治认同与社会信任,并最终影响到未来社会的政治发展乃至政治文明。已有文献系统考察了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内在和外在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学习与生活经历、大众传媒、互联网、疫情等方面的影响^[17-20]。少量研究关注了高校层面的影响因素,如校内组织与人际关系认同、校园与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程度,以及对校园管理的满意度和参与情况^[21]。而政策供给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评估是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常见的议题,研究者已经广泛讨论了政府各种类型政策供给的政治信任效果,例如医疗资助政策、医保供给政策、住房保障政策以及农村精准扶贫政策等^[22-24]。这些研究均发现,能否从政策中获益是影响政治信任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实证分析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影响的国内外研究尚未可见。

纵观已有文献可知,研究普遍认可资助育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但尚未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层

面评估资助育人的效果。总体而言,已有文献需要进行两方面的拓展:第一,在经济资助影响大学生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识别两者的因果关系,因为对大学生政治信任而言,经济资助是一个内生变量,若直接采用 OLS (Ordinary Least Square) 计量则可能会导致二者间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第二,我国大学生资助体系构成较为复杂,如果只考察某一类型资助的政治信任效应,很难将其他资助的作用从中剥离区分,难以就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构建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

一、研究设计

(一)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信任是个体在风险条件下心理层面的理性选择行为^[25]。利己主义是政策供给影响个体政治信任的重要诱因,体现在个体会将政治信任纳入到政策的效用函数^[26]。根据利己主义的解释,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一方面,大规模、覆盖面广的经济资助让大学生直接从政策供给中受益,从而对政治信任产生积极的效应。与经济市场“理性人”的行为规律一致,对于理性的个体来说,在政治活动中也应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27]。当前,我国的政治信任正在从“经济绩效”转向“公共物品供给”,公众对政府提供教育、健康等公共政策感到满意都是政治信任的新来源^[28]。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经济资助可以满足大学生在校期间基本生活和学习方面的经济需求,促进就业质量和学生发展^[29]。这些切实的利益获得会使大学生的在校期间各方面的发展诉求得到满足,从而有可能提升政治信任水平。此外,感知“善意”也可能是经济资助影响大学生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高校长期实行“免费+人民助学金”的学生资助模式,这使得公众形成了对政府的依赖和偏好。目前,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这一倾向,注重强调政府供给责任和对民众的关怀。

另一方面,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过高的政策预

期以及来自竞争的公共资源问题等,都可能导致经济资助对大学生的社会信任水平带来负向效应。一是当人们感知自己和他人拥有相差较大的文化和对世界的解释系统等信息时,更容易对双方的利益重合度做出悲观预期,更不容易产生信任^[30]。目前,除助学贷款实行“应贷尽贷”外,我国大学生奖/助学金等其他类型的经济资助项目都是先在高校之间进行分配,然后由高校分配给院系,最后由院系评定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或学业成绩,并将资助项目分配给具体的个人。这种分配机制使得资助项目在院校、系、专业、班级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和不均衡性。质量越高的大学(如 985 大学)就读的学生得到了更多的资助而支付更低的学费^[31]。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会让大学生产生不公平感,极易诱发“体制怨恨”,进而降低政治信任水平。二是政策供给容易刺激民众福利诉求的增长,现有供给水平会显著提高民众对该项政策的期望^[32]。中国大学生经济资助体系构建时注重强调政府责任,逐步强化大学生对政府责任和关怀的心理感知。与此同时,也可能造成其对政府过高的政策预期,使得在供给增长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大学生的政策期望超过供给水平,进而对政治信任水平产生消极影响;最后,作为公共资源,奖/助学金的竞争可能会加剧大学生政治不信任程度。公共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没有排他性的物品^[33]。其本质属性即暗示了“公用的悲剧”的发生,无法避免大学生可能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对经济资助等公共资源进行争夺的情况^[34]。近 20 年来,尽管我国政府已逐年加大对大学生经济资助的投入力度,但是相对于资助育人的需求来说还有较大距离,加上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这无疑会放大大学生对助/奖学金的争夺,从而削弱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

在现实中,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上述两种作用机制的相对强弱。这是一个有待实证研究的问题,需要基于实地的第一手调查数据给出科学回答。据此,本文首先提出两个有待验证的竞争性研究假设:

H1: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H2: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消极的负向作用。

政治信任的表现形式由公共政策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因素决定,关键变量是从公共政策中的获利程度,获利越多,信任度也就越高^[35]。目前,关于资助育人的效果评估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只对大学生是否获得经济资助的区分,不按经济资助项目的类型进行分类;二是只研究某一类型经济资助项目的育人效果。以上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项目在性质、功能、时间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将他们混合在一起则很有可能会混淆经济资助的影响效应。我国大学生经济资助项目划分为无偿型资助和偿还型资助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各种类型的奖/助学金项目,用于大学生入校以后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旨在“奖优”和“助困”,不需要偿还;后者包括助学贷款,主要用于大学生入学时支付学费和住宿费,旨在“入学”时进行资助,政府财政补贴利息,但大学生在毕业后要进行偿还。可以看出,两种资助类型提供给大学生的经济利益差别是非常大的。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具有异质性影响效应

(二)研究方法

针对所有特定的大学生个体,他们在现实中只能拥有一种状态下的政治信任水平:获得经济资助下的政治信任水平($PoliticalTrust_1$);未获得经济资助下的政治信任水平($PoliticalTrust_0$)。即实际观测到的政治信任水平为: $PoliticalTrust = D \times PoliticalTrust_1 + (1 - D) \times PoliticalTrust_0$,这就产生了“反事实缺失数据”。如果所有样本均按照随机原则选择是否获得经济资助,那么获得经济资助的大学生样本(干预组)和未获得经济资助的大学生样本(对照组)的个人特征分布基本一致,其区分标准仅为是否获得经济资助,对照组的政治信任水平可作为干预组“反事实缺失”的政治信任

水平,进而可通过最小二乘估计(OLS)得到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的无偏估计。然而,大学生是否获得经济资助并非随机决定的,并不符合上述随机分配的条件。另外,大学生是否获得经济资助有可能会受到某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如性别、家庭收入、院校特征等,而这些不可观测因素又有可能跟政治信任水平有关,如果依旧通过 OLS 做参数估计,则可能得到有偏的结果。为求尽可能降低估计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方法来计量估计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ATT)。

PSM 模型通过倾向得分来模拟随机实验过程,为干预组样本找到特征近似的对照组样本而与之匹配,确保两组样本分布的随机性从而控制选择性偏差^[36]。文中 PSM 模型的核心目标是借助倾向得分找到一组与获助大学生在可观测特征相似的未获助大学生进行政治信任水平的比较,因为两组样本的可观测特征是相似的,所以两组样本学生的政治信任的差异可以解释为经济资助项目的贡献,即经济资助项目带来的政治信任影响效应。

选定变量和方法后,本文按照以下 3 个步骤执行 PSM 模型:

第一步,计算倾向得分。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即给定条件下接受干预的条件概率。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概率(倾向得分)为本文通过 Probit 模型计算新生获得经济资助的倾向值得分(概率),具体表示如下:

$$P_{getaid}(X_i) = Prob(getaid = 1 | X_i) = \Phi(X_i) \quad (1)$$

在式(1)中, P_{getaid} 为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的倾向值或概率,若获得了经济资助,则 aid 取值为 1,否则为 0; X_i 代表选定的匹配变量。

第二步,检验匹配效果。要估计干预的反事实结果,保证匹配的实施,需要匹配的样本满足条件独立假设(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CIA)和共同区间要求(Common Support)。前者的

检验一般在匹配前就需要对协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计算协变量的标准化平均值差异。后者的检验一般是通过倾向指数分布图,即在估计出倾向指数后,直接画出匹配前后获助大学生和未获助大学生的倾向指数分布图(概率密度图或直方图),观察匹配效果。

第三步,样本匹配。将干预组($D=1$)中的每一个观测值与对照组($D=0$)中倾向得分相近的观测值进行匹配,即为每一个干预组样本找到一个与其倾向得分最相近的对照组样本相匹配。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半径匹配方法(Radius Matching)、最邻近匹配方法(Nearest Neighbors Matching)和核匹配方法(Kernel Matching)等不同的匹配法进行匹配估计,获得计量估计经济资助对全体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ATE)、对获助大学生的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ATT)、对未获得资助大学生的非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Untreated Group, ATU)3个因果效应参数的估计。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课题组在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支持“湖南高校大学生发展”两轮调查问卷。湖南省是传统的高等教育大省,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中一直位居前列,高校数量众多,且包含了各种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湖南省大学生资助在全国也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在资源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湖南省作为问卷调查实施地点是比较适切的。问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PPS),课题组从湖南省41所全日制本科高校中随机抽取了22所为样本高校,课题组重点收集了这些样本高校的层次、规模、专业分布、资助政策等信息,并开展了调研员培训和预调研。第一轮问卷调研的对象是2016级本科生,调研时间是2016年10—11月,选择这个时间开展问卷调研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2016级本科生在2016年9月入学后立即开

展军训和入学教育,不利于集中填写调研问卷;另一方面,大学生资助政策是高校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新生要全面、系统学习助/奖学金等经济资助项目的具体信息,大学新生贫困生认定和助学金申请、评选要在当年10月前完成(大学生学业奖学金要在第二学年才开展)。课题组根据学号随机从22所高校的每个院系的每个专业抽取了20%的大学生,共抽取16806份样本数据。接下来,课题组在22所高校学工部门的支持下,组织样本学生现场填写问卷,对收回的问卷进行清理后共获得16635份有效的基期样本,有效率为98.98%。第一轮问卷调研主要收集了详细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如年龄、性别、高考成绩、家庭背景、父母职业、父母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调研问卷还详细询问了大学生的学费及来源、经济资助项目的申请和获得金额,以及对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期待等详细情况。

第二轮问卷调研实施时间是2018年11—12月实施,选择这个时间点的主要原因是样本高校已经完成2016级本科生两个学年奖学金的申请与评选。课题组从22所高校随机抽取7所高校,再在这些高校对50%的基期样本进行追踪调研,共发放问卷2608份,经过数据清理后有效追踪样本2557份,样本追踪有效率为98%。第二轮主要考察了基期样本在追踪期间申请与获得奖/助学金等资助项目情况,以及开展了大学生政治信任的预调研和正式问卷测量。由于两轮调查问卷在院校、个人层面均进行了严格的随机抽样,样本对湖南高校本科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情况、政治信任水平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大学生政治信任。为与大多数文献保持一致,本文从广义上使用政治信任的概念,并从以下3个层面对政治信任进行操作化处理。第一层面,即政治信任的最高层次,大学生对于政治制度的信任,是大学生作为一国公民所具有的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总和;第二层面,大学生对于

广义政府的信任。既包括纵向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层级,同时包括诸如教育部门、发改委、公检法机构在内的广义政府机构;第三层面,大学生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既包括对政治领域的信任,也包括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作为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工作人员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政府,因而公民对于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理应作为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部分予以考虑。

政治信任的多维性决定了政治信任测量指标的多样化。考虑到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与农民工、官员或社会公众等群体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政治信任的形成过程也有明显差异,本文采用已有文献中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大学生政治信任测量指标^[37]。该测量指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和对政府官员的信任,见表1。测量回答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从“1 = 非常不信任”到“5 = 非常信任”计分。

表 1 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测量题项

指标名称	题项
政治制度信任	Q1 是否对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充满信心?
	Q2 是否信任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
政府部门信任	Q3 是否认为“中央政府总是为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情”?
	Q4 是否认同“家乡的政府总是为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情”?
	Q5 对于教育部门、发改委认同度如何?
	Q6 对于公检法部门和军队的认同度如何?
政府官员信任	Q7 是否信任党和国家领导人?
	Q8 是否信任家乡所在地的政府工作人员?

2. 自变量

自变量为大学生是否在追踪调研期间获得的经济资助。若大学生在追踪调研期间获得过奖/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某一种或几种类型的经济资助,即为干预组样本,则赋值为 1;若大学生在追踪调研期间未获得任何类型的经济资助,即为对照组样本,则赋值为 0。此外,我们将经济资助按照“获利程度”进行分类,将各种类型的奖/助学金划分为无偿型资助,即干预组 1,将助学贷款划分为偿还型资助,即干预组 2,将同时获得两种类型经济资助的样本设定为干预组 3。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个体特征变量,

即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生干部、高考成绩、专业;二是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即父亲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户口类型、生源省份;三是院校特征变量,即院校是否为二本以上院校。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IF)平均为 1.46,小于 2,即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一方面,从因变量可以看出,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为 34.64 分,整体上要远高于采用同样题项测量的农民工、新社会阶层人士等群体政治信任水平。大学生对于现行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较高,展示出了较强的制度自信。在政府部门信任方面,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同样表现出当前国内政府部门的差序信任特点,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要高于地方政府。从总体上来看,大学生群体对政府部门依旧有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从自变量可以看出,干预组样本为 1260 份,占总样本的 49%,表明接近一半的大学生能够获得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其中,干预组 1(仅获得无偿型资助)样本 949 份(占总样本的 37%),干预组 2(仅获得偿还型资助)样本 87 份(占总样本的 3%),干预组 3(同时获得两种类型资助)样本 224 份(占总样本的 9%),当前多元混合的大学生经济资助体系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另一方面,无论是大学生总体政治信任水平,还是政治制度信任、政府部门信任、政府官员 3 个维度,干预组的均值均要高于对照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获得经济资助的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要优于未获得经济资助的大学生,经济资助与大学生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相关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关性并不代表经济资助与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更不能由此推论经济资助提升了大学生政治信任。因为这种相关性可能是由内生性导致的,从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看,大学生是否获得经济资助具有明显的“自选择”或“他选择”特征,无法用普通 OLS 回归模型获得准确的政策处理效应,否则可能使该效应被低估或高估。由此,需要寻找能够克服内生性和自选择性问题的计量模型,以准确估计经济资助与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2 变量、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赋值	总体		干预组	对照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因变量					
总体政治信任	140 分	34. 64	5. 02	34. 79	34. 50
政治制度信任	110 分	8. 96	1. 33	9. 03	8. 89
政府部门信任	120 分	17. 07	2. 76	17. 13	17. 01
政府官员信任	110 分	8. 61	1. 38	8. 63	8. 60
自变量					
干预组总体	1 = 是,0 = 否	0. 49	0. 50	1	0
干预组 1	1 = 是,0 = 否	0. 37	0. 48	0. 75	0
干预组 2	1 = 是,0 = 否	0. 03	0. 18	0. 07	0
干预组 3	1 = 是,0 = 否	0. 09	0. 28	0. 18	0
控制变量					
年龄	年龄,岁	20. 25	0. 85	20. 29	20. 22
性别	男生,1 = 是	0. 48	0. 50	0. 40	0. 56
政治面貌	党员或团员,1 = 是	0. 97	0. 17	0. 98	0. 96
学生干部	大学生干部,1 = 是	0. 50	0. 50	0. 54	0. 46
高考成绩	标准化的高考成绩	- 2. 95e - 11	1. 00	0. 06	- 0. 06
专业	理科生,1 = 是	0. 46	0. 50	0. 47	0. 45
贫困生	学校认定的贫困生,1 = 是	0. 17	0. 38	0. 33	0. 02
父亲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年	10. 38	3. 23	9. 81	10. 93
父亲职业	政府部门任职,1 = 是	0. 05	0. 22	0. 03	0. 08
人均年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万元	1. 61	1. 51	1. 24	1. 97
户口类型	农村户口,1 = 是	0. 63	0. 48	0. 71	0. 56
生源	东部生源,1 = 是	0. 15	0. 36	0. 12	0. 18
院校层次	一本或二本,1 = 是	0. 79	0. 41	0. 83	0. 75
观测值		2557	2557	1260	1297

四、实证结果

(一) 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的倾向得分

根据 PSM 模型的研究逻辑, 本文首先采用 Probit 模型估计了大学生是否获得各类经济资助的概率, 见表 3。通过概率估计获得倾向得分, 进而完成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匹配。年龄、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学校认定的贫困生、户口类型、院校层次对获得经济资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性别、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东部生源对获得经济资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来看, 各特征变量对获得不同类型的资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 具备女生、党员或团员、学生干部、高考成绩越好、贫困生、父亲不在政府部门任职、家庭年收入越低等特征的大学生更可能获得无偿型资助; 年龄越大、学生干部、高考成绩越低、农村户口、中西部生源的大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偿还型资助; 年龄越大、女生、党员或团员、高考成绩越低、学校认定的贫困生、家庭年收入越低、中西部生源、二本院校的大学生越可能同时获得两类资助。

表3 大学生是否获得各类经济资助的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1) 是否获得 经济资助	(2) 仅获得无 偿型资助	(3) 仅获得偿 还型资助	(4) 同时获得 两类资助
年龄	0.050 * (0.028)	-0.050 ** (0.024)	0.115 *** (0.041)	0.127 *** (0.043)
性别	-0.524 *** (0.069)	-0.423 *** (0.074)	0.205 (0.138)	-0.241 *** (0.086)
政治面貌	0.500 *** (0.150)	0.296 ** (0.125)	0.107 (0.284)	0.607 *** (0.215)
学生干部	0.191 *** (0.063)	0.194 *** (0.041)	0.155 * (0.086)	-0.101 (0.062)
高考成绩	0.019 (0.033)	0.083 *** (0.018)	-0.170 *** (0.052)	-0.074 ** (0.038)
专业	0.193 * (0.111)	0.140 * (0.081)	0.010 (0.141)	0.068 (0.109)
学校认定的 贫困生	1.645 *** (0.137)	0.639 *** (0.072)	-0.097 (0.209)	0.933 *** (0.114)
父亲受教育 程度	-0.023 *** (0.004)	-0.017 (0.011)	0.008 (0.023)	-0.018 (0.020)
父亲职业	-0.308 ** (0.146)	-0.275 ** (0.137)	-0.415 (0.423)	-0.026 (0.425)
家庭人均 年收入	-0.101 *** (0.036)	-0.062 ** (0.025)	-0.041 (0.056)	-0.263 ** (0.127)
户口类型	0.094 ** (0.038)	-0.032 (0.079)	0.271 ** (0.124)	0.226 (0.174)
生源	-0.208 * (0.109)	-0.022 (0.122)	-0.520 *** (0.196)	-0.283 ** (0.127)
院校层次	0.327 *** (0.126)	0.245 (0.177)	-0.187 (0.218)	0.249 *** (0.075)
Constant	-1.550 ** (0.648)	0.430 (0.600)	-4.471 *** (1.024)	-4.554 *** (1.106)
Observations	2557	2557	2557	2557
Pseudo R ²	0.198	0.079	0.064	0.203

注: 括号中的稳健性标准误, *** p < 0.01, ** p < 0.05, * p < 0.1。

(二) 匹配效果检验

PSM 模型需要同时满足条件独立假设与共同支撑假设。前者是指可观测特征变量 X 既可影响大学生 j 是否获得经济资助, 又对 j 的政治信任产生影响, 但却不会受到个体政治信任的反向干预, 通过匹配过程对可观测变量进行充分控制后, 大学生是否获得经济资助就可被视为随机分配的过程。后者要求获得经济资助和未获得经济资助的大学生在倾向得分上有重叠的区域。

1. 平衡性检验。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关注的是具有相同倾向得分的大学生在获得经济资助上是否呈现出随机分配的过程, 从而保证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的准确性。本文采用最核匹配法对 Probit 模型的倾向得分进行匹配, 协变量在匹配前后的结果变化情况, 见表 4。文献表明, 各协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差越小, 说明匹配效果越好^[38]。当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小于 20 时, 可以获得可靠的匹配效果^[39]。表 4 显示, 在完成匹配之后, 两组样本协变量的标准偏差都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从匹

配前的 26.8 降为匹配后的 3.6。且除年龄和专业外, 所有协变量的偏误在平衡后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削减。其中, 学校认定的贫困生实现了最大幅度的偏误削减, 降幅达到了 99.1%。总体上, 表 4 中的所有 t 值下降而 p 值增大, 大部分协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各协变量的均值水平已经非常接近, 匹配效果较好。说明样本匹配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大学生在可观测特征上的显著差异, 获得经济资助的个体差异便能够被视为随机分配的结果, 满足条件独立假设。其他干预下的平衡性检验结果与表 4 相似, 不再赘述。

(三) 共同支撑假设检验

本文还检验倾向得分值匹配下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共同支撑假设, 见图 1。经过两组样本匹配后, 干预组与对照组变得相对拟合与聚拢, 两组样本之间重叠区域也稍微变得更为宽泛, 即通过两组样本匹配, 能够尽可能控制大学生在可观测特征上的组间差异, 有利于科学计量估计大学生经济资助的净效应。

表 4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偏差	偏差消减	t	p > t
		干预组	对照组				
年龄	匹配前	20.29	20.22	8.5	-12.5	2.16	0.031
	匹配后	20.25	20.33	-9.6		-2.12	0.034
性别	匹配前	0.40	0.56	-31.8	94.7	-8.03	0
	匹配后	0.40	0.39	1.7		0.39	0.7
政治面貌	匹配前	0.98	0.96	13.9	70.5	3.51	0
	匹配后	0.98	0.99	-4.1		-1.42	0.155
学生干部	匹配前	0.54	0.45	17.5	63.1	4.42	0
	匹配后	0.53	0.56	-6.5		-1.46	0.144
高考成绩	匹配前	0.06	-0.06	11.5	95.1	2.9	0.004
	匹配后	0.03	0.03	0.6		0.14	0.892
专业	匹配前	0.47	0.45	2.5	-240.1	0.63	0.526
	匹配后	0.45	0.41	8.5		1.95	0.052
学校认定的贫困生	匹配前	0.33	0.02	88.4	99.1	22.49	0
	匹配后	0.21	0.20	0.8		0.16	0.872
父亲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	9.81	10.94	-35.3	96	-8.93	0
	匹配后	10.01	10.06	-1.4		-0.34	0.735
父亲职业	匹配前	0.03	0.08	-22.20	89	-5.58	0
	匹配后	0.03	0.03	-2.4		-0.7	0.484
家庭人均年收入	匹配前	1.24	1.97	-49.7	87.4	-12.54	0
	匹配后	1.30	1.39	-6.3		-1.88	0.061
户口类型	匹配前	0.71	0.56	30.9	96.8	7.82	0
	匹配后	0.70	0.69	1		0.23	0.819
生源	匹配前	0.12	0.18	-16.9	96.6	-4.27	0
	匹配后	0.12	0.12	0.6		0.14	0.886
院校层次	匹配前	0.83	0.75	19.7	81	4.97	0
	匹配后	0.83	0.81	3.7		0.89	0.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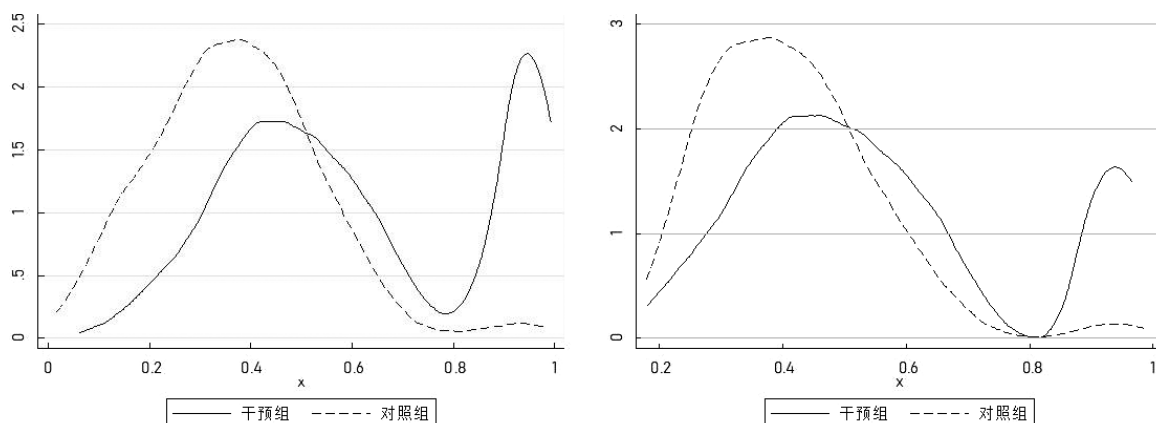


图1 匹配前后的核密度

(四)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平均处理效应分析

通过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后,采用前文提及的3种匹配法的5种匹配策略组合,估计经济资助影响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净效应,即平均处理效应(ATT),5种匹配策略分别为核匹配、最近邻匹配、近邻匹配和两种半径匹配(卡尺匹配)。技术处理方面,最邻近匹配与邻近匹配分别采取了一对四($K=4$)和一对一($K=1$)的匹配策略,半径匹配(卡尺匹配)则选择了距半径“较近”的范围(Radius = 0.01),核匹配则采用了0.03的核函数带宽,采用5种匹配策略一方面能得到参数估计的取值区间,另一方面则能够实现稳健估计。表5报告了上述5种匹配策略对ATT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5显示,经济资助的ATT效应在五种匹配策略下分别为1.581、1.593、1.565、1.717及1.561,并且估计结果均在0.01或0.05的水平上显著,其含义可以理解为相对于对照组,干预组样本的政治信任水平要高1.581、1.593、1.565、1.717及1.561分,平均为1.603分,即获得资助的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水平比未获得经济资助的大学生平均高出1.603分。

表6进一步展示了经济资助对大学生各维度政治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资助显著提高了大学生3个维度的政治信任水平。具体而言,干预组大学生的政治制度信任水平要比对照组平均高0.5分,政府部门信任水平要比对照组平均高0.6分,政府官员信任水平要比对照组平均高出

0.4分。各类匹配方法下的拟合结果趋同,结果较为稳健。在利用PSM控制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样本差异后,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而研究假设H2被拒绝,即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表明,目前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中,第一条机制占据主导。

表5 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

匹配方法	参数	系数	标准误	Z	P
核匹配	ATT	1.581	0.640	2.47	0.013
	ATU	0.332	0.261	1.27	0.203
	ATE	0.937	0.373	2.51	0.012
最邻近匹配 ($k=1$)	ATT	1.593	0.741	2.15	0.032
	ATU	0.402	0.331	1.21	0.225
	ATE	0.979	0.412	2.37	0.018
近邻匹配 ($k=4$)	ATT	1.565	0.702	2.23	0.026
	ATU	0.423	0.306	1.38	0.166
	ATE	0.976	0.410	2.38	0.017
半径匹配 ($k=0.01$)	ATT	1.717	0.639	2.69	0.007
	ATU	0.321	0.264	1.22	0.224
	ATE	0.998	0.374	2.67	0.008
半径匹配 ($k=0.03$)	ATT	1.561	0.649	2.41	0.016
	ATU	0.355	0.259	1.37	0.171
	ATE	0.938	0.375	2.5	0.012

注:为克服潜在小样本偏误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上表中的标准误和P值均采用自抽样法重复500次检验计算得出,以确保拟合结果的稳健性。下同。

(五)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根据本文将干预组样本分成3个前文所述的干预组1、干预组2和干预组3等3组样本,并同样使用3种匹配方法分别进行估计,结果列于表7。从表7可以看出,干

预组 1 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干预组 2 和干预组 3 虽然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效应在统计上都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积极影响主要发生在干预组 1,即获得各种类型奖/助学金的大学生。而本文的研究还证实,仅获得偿还型

资助和同时获得无偿型资助与偿还型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H3,即在利己主义角度,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提供给大学生的经济利益有较大差别,从而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效应也是具有异质性的。

表 6 获得经济资助对各维度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差异

干预方案	核匹配		最邻近匹配 (k = 1)	最邻近匹配 (k = 4)	半径匹配 (k = 0.01)	半径匹配 (k = 0.03)	平均
	ATT						
政治制度信任	ATT	0.475 ***	0.436 **	0.452 **	0.509 ***	0.473 ***	0.469
	ATU	0.117 *	0.112	0.127	0.114	0.120 *	0.118
	ATE	0.290 ***	0.269 **	0.284 ***	0.305 ***	0.291 ***	0.288
政府部门信任	ATT	0.692 **	0.701 *	0.697 **	0.757 **	0.674 **	0.566
	ATU	0.145	0.156	0.194	0.133	0.157	0.157
	ATE	0.410 **	0.420 *	0.438 **	0.435 **	0.407 **	0.422
政府官员信任	ATT	0.415 **	0.455 **	0.416 *	0.452 ***	0.414 **	0.430
	ATU	0.071	0.133	0.102	0.075	0.078	0.092
	ATE	0.237 **	0.290 **	0.254 **	0.258 ***	0.240 **	0.256

注:括号中的稳健标准误,*** p < 0.01, ** p < 0.05, * p < 0.1。

表 7 不同类型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差异

干预方案	对照组 - 干预组 核匹配样本数	参数	核匹配	近邻匹配 (k = 1)	近邻匹配 (k = 4)	半径匹配 (k = 0.01)	半径匹配 (k = 0.03)	平均
干预组 1	1300 - 772	ATT	0.526 **	0.297	0.483 *	0.542 *	0.517 **	0.473
		ATU	0.376	0.512 *	0.444 *	0.400 *	0.369	0.420
		ATE	0.433 **	0.431 *	0.458 **	0.453 ***	0.424 *	0.440
干预组 2	2009 - 73	ATT	0.099	-0.092	-0.230	0.063	0.109	-0.010
		ATU	-0.502	-0.415	-1.036	-0.564	-0.438	-0.591
		ATE	-0.481	-0.404	-1.008	-0.542	-0.419	-0.571
干预组 3	1818 - 180	ATT	-0.345	-0.529	-0.455	-0.396	-0.327	-0.410
		ATU	-0.482	-1.084	-0.156	-0.409	-0.568	-0.540
		ATE	-0.469	-1.033	-0.184	-0.408	-0.545	-0.528

注:括号中的稳健标准误,*** p < 0.01, ** p < 0.05, * p < 0.1。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第一,当前大学生资助政策总体上具有精准性。年龄越大、女生、贫困生、父亲受教育程度越低、父亲在非政府部门任职、家庭年收入越低、农村、中西部生源、二本以上院校等特征的大学生越有可能获得经济资助。本文的实证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当前大学生精准资助的实施效果。当然,经济资助在院校之间的分配存在较大差异,二本及以上层次院校的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和同时获得两种类型经济资助的概率显著更高,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和高校采用逐层分配指标的办法确定,并未与大学生的实际资助需求挂钩,容易造成不同形式的资助瞄准的偏误所致。

第二,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具有

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对政府部门信任水平的提升最高。

第三,由于获利程度不同,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仅获得奖/助学金等无偿型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仅获得助学贷款等偿还型资助、同时获得无偿型和偿还型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 建议

第一,通过自然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揭示并确定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就为决策部门推行精准资助、大力倡导资助育人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资助不仅能够对大学生进行“助困”和“奖优”,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即有利于

提高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

第二,经济资助对于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复杂的,故对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其资助育人的要求也应当有所差别。对于获得奖/助学金等无偿型资助的大学生,资助育人严格执行现行资助标准,让精准资助政策公平地惠及所有应当享有权利的大学生,由此避免资助目标的偏离,降低大学生因资助分配不公而产生的不平等厌恶,从而避免精准资助政策投入的内卷化、争夺所引致的政治信任下降;对于获得助学贷款等偿还型资助的大学生,资助育人要致力于打破对政府的过度依赖,逐步凸显个人和市场在经济资助体系中的作用,着力弱化全能政府的角色。

第三,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设计时关注政府责任的凸显,帮助提高大学生对政府责任和关怀的感知水平的同时,极易引发大学生对政府责任期望的过度增长,使得在供给增长相对有限时导致政治信任的下降。资助育人不仅要体现在促进大学生发展的可持续性上,更要注重对大学生政府责任期望的管理,避免大学生过高的政府责任期望对政治信任的损害,使得经济资助提升大学生政治信任的正面效果能够稳定发挥。

参考文献:

- [1] 沈红,等. 中国高校学生资助的理论与实践(1997—2016)[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2.
- [2] 余秀兰. 60年的探索:建国以来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探析[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4(1):151-163,192.
- [3] 韩丽丽,李廷洲.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等教育资助体系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高教研究,2018,35(6):29-36.
- [4] 马翠廉,赵纯凯. 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与恐怖主义:来自上合组织的证据[J]. 中国软科学,2021(1):11-20.
- [5] 甘宇. 错位与链接:高校贫困生资助资源的配置及其减贫效果——基于C市33所高校调查的分析[J]. 教育与经济,2014(5):54-60.
- [6] 胡寿平. 财政资助政策对高等教育入学和大学生学业成功的影响: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 复旦教育论坛,2010,8(2):79-83.
- [7] 陈乃车,曾剑. 提升高校资助育人成效的路径探析[J]. 教育研究,2017,38(5):152-155,159.
- [8] HU S. Scholarship awards, student engagement, and leadership capacity of high-achieving low-income students of

color[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2,82(5):511-534.

- [9] 沙莉,陈晓龙. 协同创新视角下的大学生学业引导与管理模式研究[J]. 科学决策,2021(9):130-136.
- [10] HUANG W, LI F, LIAO X, et al. More money, better performance? the effects of student loans and need-based grant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 51:208-227.
- [11] 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5.
- [12] 郭凤林,刘颜俊. 医保供给与政治信任:供给水平与期望增长的速度竞赛[J]. 社会发展研究,2020,7(2):178-195.
- [13] 赵健池,王正绪. 政治信任:概念史回溯与实证研究反思[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95-204.
- [14] 赵延东,叶锦涛,何光喜. 突发风险事件中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1(7):40-51.
- [15] 李艳霞.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以代际差异为视角的比较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2017,14(3):60-72.
- [16] HETHERINGTON MJ.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92(4):791-808.
- [17] 李砚忠,卞恺甜. 新冠肺炎疫情下高校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分析研究[J].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21,161(1):42-53.
- [18] 邓美玲,彭华. 社会分层视角下的90后大学生政治信任研究[J].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报,2014,8(1):60-64.
- [19] 曲昭伟,牛堃瑛. 网络媒体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3):99-103.
- [20] 王正祥. 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J]. 青年研究,2009,365(2):64-74,96.
- [21][37] 方曦,王奎明. 大学生政治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学校层面的分析[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53-62.
- [22] ZHONG Y. Do Chinese people trust their local government, and why? [J].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14, 61(3):31-44.
- [23] LÜX. Social policy and regime legitimacy: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4, 108(2):423-437.
- [24] ZHONG L, XIAO W. Social policy and political trust:

- evidence from the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in China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8,235(September):644-668.
- [25] FISHMAN R, KHANNA T. Is trust a historical residue? Information flows and trust levels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99, 38(1):79-92.
- [26] KUMLIN S. 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 how personal welfare state experiences affect political trust and ideology [D]. Göteborg University, 2002.
- [27] ROTHSTEIN B. Crea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electoral democracy versus quality of government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9, 53(3):311-330.
- [28] 石文萍, 王欢, 窦倩倩, 等. 网络权力、资源占用与合作行为——组织间信任与标杆效应的调节作用 [J]. 科学决策, 2020(5):25-43.
- [29] 曲垠姣, 岳昌君, 纪效琿. 大学生经济资助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 39(1):85-90.
- [30] LEWIS J, WEIGERT A. 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 [J]. Social forces, 1985(4):967-985.
- [31] 罗朴尚, 宋映泉, 魏建国. 中国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评估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1(1):68-79.
- [32] 赛奇, 托尼, 周凤华. 中国社会福利政策: 迈向社会公民权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51(4):24-31.
- [33] MANKIWN G.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M]. OH: South Western College, 2011.
- [34] 史宇鹏, 李新荣. 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 以义务教育为例 [J]. 经济研究, 2016(5):86-100.
- [35] 张维迎, 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2(10):59-70, 96.
- [36] ROSENBAUM P R, RUBIN D B. constructing a control group using multivariate matched sampling methods that incorporate the propensity score [J]. American statistician, 1985, 24(4):521-544.
- [37] 于大川, 丁建定. 社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事实评估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0(2):107-115.
- [38] ROSENBAUM P R, RUBIN D B.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J]. Biometrika, 1983, 70(1):41-55.

(本文责编: 海 洋)